

新巢文叢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冰火重天

詹庆生
著

现代性问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代际冲突



四川大学出版社

冰火重天

现代性的断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代际冲突

詹庆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黄妍

封面设计：罗光

责任校对：朱兰双

责任印制：曹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火重天：现代性问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代际冲突 / 詹庆生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1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 / 曾绍义主编)
ISBN 7-5614-2759-X

I. 冰... II. 詹...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②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521 号

书名 冰火重天——现代性问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代际冲突

作者 詹庆生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17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总序

曾
绍
义

这是一套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丛书，每个专题一本，从詹庆生同志的《冰火重天——现代性问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代际冲突》开始陆续出版，即将面世的计有游翠萍同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革命者形象研究、赵雷同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学问题研究、廖久明同志关于作家高长虹的“冤案”研究、王玉春同志关于现代中国女作家的“童年经验”研究、康鑫同志关于曹禺创作的最新研究等成果……

研究对象之所以确定为“现代中国文学”而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只有将学科建设置于“现代国家”的观念中进行长远的、全面的、宏观的规划与实践，其结果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合乎事物本来

面目的，而不再显出片面、浮浅与捉襟见肘。无论将“现代中国”的出现定于何时，因从国家观念出发，发生在“现代中国”里的所有文学现象，便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新文学”、“新时期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翻译文学”、“留学生文学”、“旧体诗词”，以及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等等，统统包容其中，即可形成“上可封顶下不封底”富有生气的、灵活的全新研究格局，这就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研究才是立体的、系统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研究。

丛书之所以取名“新巢”，原因也只有一个：丛书作者都是我所带的硕士研究生，他们大多只有二十多岁，且都有成为“专家”的学术研究潜力，编入本“丛书”的著作又都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处女作”——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算作是他们初步“成家”搭成的“新巢”。与学术上的那些高楼大厦相比，这些新搭建的窝巢也许显得有些粗糙，但它毕竟已是一个“家”：只要从这里出发，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这些“新巢”的创建者们就一定会耸立起他们自己的高楼大厦，成为学术研究的大家！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为丛书主编，除了感谢作者们特别的辛劳与执著（丛书主体内容都是在校期间完成一般硕士生必须完成的学业之余写成的，因此他们往往有假不休、有家不回、有亲不探，即使走上工作岗位后也从未停歇），还应特别感谢詹庆生同

志。是他在 1998 年 9 月刚入学不久的一次专业学位课的作业里，从现代性现象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设想，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我逐渐产生了主编一套全由我带出的硕士生撰写的学术研究丛书的愿望。

总之，“新巢”的主人们让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浩浩学海涌起的又一股学术新潮！“新巢”既是已有收获的象征，又是继续前行的起点，更是一种激励与催促。衷心祝愿“新巢文丛”的年轻作者们奋进不息，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也恳切祈盼前辈学者能对本丛书提出宝贵的批评。

2003 年 12 月 1 日于成都
川大花园南区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性问题导论	(1)
一、“现代性”概念及“现代学”构建.....	(1)
1. “现代性”之概念及其分裂	(2)
2.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9)
二、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	(14)
1. 严复《天演论》与时间意识的改造.....	(14)
2. “启蒙”与“救亡”，变奏还是合奏?	(19)
3. 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与 “激进派”	(27)
4. “封建”或是“现代”——对 80 年代又一 “元叙事”的探讨.....	(33)
5. “新时期”的现代性叙事及其变迁	(48)
三、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56)
1. 文学的全面理性化及其主要表现形态.....	(56)
2.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	(82)
3. 重审“现代性”的文学史意义.....	(92)
第二章 “代际冲突”及其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 现代性意义	(149)
1. “现代性”研究与“知识考古学”方法.....	(149)
2. “代”、“代际冲突”及其两种形式.....	(152)

2 冰火重天

3. 人格成长、俄底浦斯情结与象征秩序	(157)
4. “家”与“国”的寓言.....	(161)
5. 百年中国文学中代际冲突的演变及其 现代性意义	(165)
第三章 进化抑或轮回：鲁迅小说中的思想悖论.....	(172)
1. 《狂人日记》：“真的人”与“真的人”的幻灭	(173)
2. 《在酒楼上》、《孤独者》：冲突的声音	(179)
3. 现代性：捍卫还是背离？	(189)
第四章 “新”与“旧”的斗争之境：家族文学中的 “弑父情结”	(196)
1. “问题小说”与“五四”初期的代际冲突.....	(197)
2. 《家》：“空间场景的时间化”	(199)
3. “超故事叙述者”与话语的自我解构.....	(204)
4. “叛徒”觉慧的真相.....	(207)
5. 《家》的“语法”与《雷雨》的命运.....	(214)
第五章 “己”与“群”的调和与冲突：左翼、 解放区文学中的寻父意识.....	(222)
1. “己”与“群”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222)
2. “革命浪漫谛克小说”：一段尘封“公案” 的背后.....	(234)
3. 左翼文学：“己”的扩大化和“群”的狭窄化	(245)
4. 解放区文学：革命“语言”的“言语”表达 ..	(249)
5. “己”、“群”演变的极端化.....	(259)

第六章 “现代”的另一张面孔（一）：沈从文与老舍小说中的代际关系	(268)
1. 从“时间化”到“空间化”	(268)
2. 沈从文：原乡神话中的“新、旧、常、变”	(271)
3. 老舍：“老派”、“新派”及其价值反转.....	(277)
4. “传统/现代”：“京派”的文化意义	(287)
第七章 现代的另一张面孔（二）：张爱玲，“参差对照”的代际冲突	(291)
1. “弑父”的典范文本与“寻父”的反讽隐喻.....	(291)
2. “女性”故事或者“人性”寓言.....	(300)
3. “现代的”张爱玲与“不现代的”张爱玲.....	(307)
第八章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颂父”的激情与尴尬	(313)
1. “颂歌”时代的“潜文本”与内在裂隙.....	(313)
2. “颂父”的经典模式及其困难.....	(317)
3. 农村题材小说中代际冲突的形式转换	(322)
4. “史诗”或“非史诗”：《创业史》与《锻炼锻炼》的不同命运.....	(335)
第九章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思想史的戏剧性“误会”	(350)
1. 林震的“震惊”体验与王蒙的“风云”遭际	(351)
2.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354)
3. “道是无情却有情”：历史的戏剧性错位	(362)
4. “来的都是青年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在医院中》	(368)

第十章 暧昧的“现代”想象：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	(374)
1. “城/乡”对立的历史演变与价值变迁	(375)
2. 《霓虹灯下的哨兵》：斗争的城市，暧昧的现代	
	(386)
3.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主义”	(395)
第十一章 伤痕、反思与改革文学：在“现代”的转折点上	(404)
1. 新时期的“家”中图景	(404)
2. 《伤痕》：共谋与冲突	(406)
3. 《蝴蝶》：代际冲突及其想象性化解	(412)
4. 《乔厂长上任记》：关于“理想父亲”的现代性文本	(427)
第十二章 后顾与前瞻：寻根文学中的代际关系	(438)
1. “寻根文学”的动机、策略以及内在分裂	(439)
2. 《小鲍庄》：“文字”与“言语”的抗争	(453)
3. 叙述的迷局：“小鲍庄”里的“罗生门”	(461)
4. 《红高粱》：“种”的退化与“种”的神话	(469)
第十三章 存在与虚无：先锋派小说中的代际冲突	(483)
1. “无父”时代的“弑父”浪潮	(484)
2. 先锋派的“意识形态”意义	(493)
3. 无处可逃的“逃亡”：宿命与自指的“家族”故事	(498)
4. 《鲜血梅花》：意义空缺的“寻父”寓言	(514)
后记	(525)
主要参考文献	(528)

第一章 现代性问题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在中国学术思想中终于“可以”成为一个“问题”——这标志着对现代性的关注不再仅是一种价值诉求，而开始向学理化的“现代学”过渡。这一迟到的领悟表明：中国的学术思想终于可以超越各种偏执的个人化的情感漩涡，摆脱种种激进的乌托邦的“主义”理想（包括“西化乌托邦”），秉承理性、客观的学术公平态度来重新检视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历程。事实上，对“现代性问题”的重审在短短的10年中已显示了强大的理论活力，它所开启的新的言说框架及知识范型在诸多领域（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激发出持续性的阐释冲动，许多创造性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源源不断地产生。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成为问题”（从“现代性诉求”到“现代学”的转向）在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无疑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一、“现代性”概念及“现代学”构建

关于“现代现象”及“现代性”的研究，在西方学术思想界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被迫

卷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也从未中断过对“现代现象”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更多地表现为非知识性的个体情绪反应。于是，我们在回顾 20 世纪中国历史时，便会发现如此众多激进的关于“现代”的鼓吹和同样激进的批判。中国 20 世纪思想学术在这种逆向撕扯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却并没能将对“现代现象”的理解导向深入，也没有产生在今天看来真正具备足够分量的关于现代现象的创造性思想成果。甚至当“现代性问题”在 90 年代成为一个新话题时，我们在各种讨论中仍看到太多概念的混淆及误用：或者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并据此得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只具“近代性”，不具“现代性”的结论；或者对“现代性”、“现代化”、“工业化”甚至“全球化”等概念不加区别，更缺乏任何反省与批判地使用。虽然“现代性”的概念言人人殊，几乎每个领域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对“现代化”的定义恐怕更是难以计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众多基本概念之间可以无原则替换，无原则的替换无疑只会加剧思想的混乱，更无益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它有什么样的基本价值内涵和思维特征？它与“现代化”及“工业化”等概念有什么联系与区别？“现代性”究竟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还是一个应然的“诉求”？它究竟是一个客观过程与批判对象，还是一个价值目标和终极目的？既然对现代性的研究最终仍是为了返归中国问题，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界定 20 世纪中国社会与思想实践中的现代性事件？

1. “现代性”之概念及其分裂

作为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的“现代”（modern）与作为

“问题”概念的“现代性”（modernity）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语义上讲，“现代”概念首先是一个时间、历史范畴，通常是指中世纪结束以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作为“问题”的“现代性”则一般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表现形态及其所蕴含的内在属性。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本质”或“属性”的现代性。德国社会思想家西美尔（Georg Simmel）认为，“现代性现象的本质是它根本没有本质”。这一悖论性的陈述表达的正是“现代性”的特征，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①——它已被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概念界说充分印证。但不论这些界说有何不同，都有一个意识源头，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尽管现代性的概念几乎是自动地联系着世俗主义，其主要构成要素却只是对不可重复性时间的一种感觉。”^②。“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种时间价值属性，即将线性发展的时间赋予价值。“过去”（传统）、“现在”（现代）、“未来”不仅是一个时间向度，而且成为新的价值向度。但是，这种时间价值意识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产生的。按卡林内斯库的考证，现代这一概念直至中世纪才诞生，兼做名词和形容词的“modernus”（现代）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

是在 12 世纪根据“modo”（意为“最近、刚才”）一词创造出来的，而在较早的拉丁语中并无“现代/古代”这种对立，因为古典拉丁思维对历时关系根本不感兴趣。12 世纪时，由于在“古代/现代”对立中“古代”享有绝对的价值优势，现代人因而干脆被看作了站在巨人（古人）肩上的侏儒——这成了一个描述“古代/现代”关系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譬喻。17 世纪的“古今之争”当中，尽管“现代”已经有了许多捍卫者，但“现代”一词仍主要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且直到 18 世纪中期甚至在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者”(modernist) 以及“现代性”(modernity) 等概念最初也不过是一些嘲讽性命名。不过，在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一词开始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并一举反转了对于“古代（传统）”的价值劣势。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的词汇》一书中，雷蒙德·威廉姆斯曾为“MODERN”条目附录了三个相关词，即“improve”（改善）、“progress”（进步）、“tradition”（传统），可见“现代”即是对于“传统”的“改善”，并最终实现了相对于“传统”的“进步”。“现代”必须且只有在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才得以界定自身。耐人寻味的是，双方的这种对抗性存在的最终归宿却是在一个蕴含着“新”的“将来”。“现代”意味着永无休止的变动以及对“现代”的永不满足，更重要的是，它更意味着一种将现存的意义与一个未来远景相联系的态度，一种将意义放置于“将来”的历史观，正如鲍曼所说：“现代性与认同有关，即与未被实现的存在事实有关，在此，认同是有待完成的任务、使命和

责任……‘今天’仅仅是明天的前兆，确切地说，是其初级的、残缺不全的反映。现在的成就被未来的成就预先作废了。但是，它从那一作废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即获得了唯一的意义。”总之，“现代性是静止的不可能性；‘现代’意味着不断运动。”^①由于“今天”必将成为标志着“现代”的“明天”的“传统”，那么在这样的线性的目的论历史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必然成为现代性的根本思维方式，这也正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价值模式的本质属性。

作为“内容”的现代性则要复杂得多。事实上，现代性并非一个单纯的社会历史进程，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现代性”的概念是一个分裂的概念，它主要表现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启蒙的现代性（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②

由于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基本形

① 齐格曼·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态都源自启蒙运动，因而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启蒙精神的另一种表述，正如韦伯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促使宗教世界观“去魅”解体，进而走向全面的世俗化或理性化的过程，而这种全面的理性化涉及意识形态、宗教、法律、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等诸多领域。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与“古代”完全不同的现代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形态。虽然韦伯对此理性化过程忧心忡忡，但这并不能影响后人对这一现代性过程的乐观想象。这种想象常与对现代化的乐观想象相一致。

正如孔多塞曾经骄傲地宣称的那样：“阳光只照耀自由人世界的时刻必将到来，人们除了理性之外不承认任何主宰，那时，暴君与奴隶、教士及其愚昧或伪善的工具均将不复存在。”^① 启蒙的现代性（社会现代化）首先在思想层面表现为对理性的绝对崇拜，宗教/形而上学的统一让位于理性的统一；对人们把握世界、把握自身的能力的绝对信任进而引导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绝对信仰态度，以及建立在时间价值模式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前景的乐观期待，这种期待更进一步则成为线性进步的目的论历史观；在此层面，理性主义与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方面，现代化表现为通过科学技术革命，推进经济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培育市场机制，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专业；政治上，代议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国家行政体制精密的科层化发展。显然，由此可以看到“工业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却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总之，现代化进程

^①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页。

从最初由启蒙运动开启的从基督教一体化世界观中解脱出来的一个世俗化过程，渐渐发展为一个社会的全面理性化过程，韦伯称之为“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审美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现代化的激烈批判者和对立面。现代化进程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繁荣、知识爆炸和文明进步，却同时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过度强调人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从而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巨大危机；理性精神的极度张扬摧毁了人们的神性信仰和终极关怀，并在现实利益的追逐中渐渐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工业文明在实用高效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千篇一律、单调雷同，从而导致了个性泯灭和艺术精神的死亡（这恰恰是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神学统治的初衷）；另外，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隔膜，人在都市社会和机器社会中的人性异化，情感的极度孤独，道德与责任感的丧失，也往往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副产品。现代化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①。正因为如此，现代性同时产生了自己的批判者——审美的现代性。“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离奇景观由此出现。从卢梭提出“返归自然”开始，一系列西方思想大师（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福柯……）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和阶级的分析揭穿了资本主义

^①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42页。